

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间 震荡的富国方略

——20世纪土耳其经济改革述评

曹瑞涛

内容提要 20世纪土耳其共和国在经济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历史证明：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完全市场经济都不适合土耳其国情。作为一个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要在几十年内走完西方世界数百年才走完的道路，就得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间找到一条适中的道路，既能加速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又能培育出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同时，经济改革作为土耳其社会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会与政治、文化、甚至国际关系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相互作用，使经济建设的成败对整个社会有重大的影响力。通过考察土耳其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得失，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关键词 土耳其 国家主义 计划经济 经济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 曹瑞涛，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杭州 310036）。

“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

1920~1923年，土耳其人民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几经血战，不仅“将希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侵略军驱逐出去，还废除了苏丹的统治，代之以土耳其共和国。进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又在外交上获得重大胜利，协约国各方在最终的和约——《洛桑条约》（1923年）中，正式承认了土耳其共和国”¹。由于共和国诞生于战火之中，前身又是遵循军国路线的奥斯曼帝国，很多人以为新生的土耳其仍摆脱不了好战之风。可土耳其的铁血军神凯末尔一待共和国成立，竟首先脱去战袍，着西装、戴礼帽，以文职总统的身份向全世界宣布：土耳其共和国将告别过去，加入到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

这一变化在情理之中，因为早在土耳其建国前，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就在伊兹密尔召开的“经济大会”^④上达成了普遍共识，即：传统奥斯曼帝国的军国主义路线已到尽头，新生的共和国要想生存，就必须在“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原则下，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凯末尔更是在大会上坦言：“那些用宝剑实行征服的人，注定将会被那些用耕犁来征服的人所克服，并且最后将让位于他们。”^④

然而，为了在国际上获得完整的政治权利，土耳其新政府不得不先在经济领域向西方列强作出巨

¹ Jeny H. Bentley Herbert F. Ziegler *Tradition & Encounter: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3, p. 995

^④ 此次会议于1923年2月召开，8个月后（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布成立。

^④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2页。

大让步。按照《洛桑条约》规定，新政府须偿还旧帝国欠下的大部分债务，并答应在 1924~1929 年不得独立制定关税，不得对外国进口商品进行数量限制。这些规定使新政府无法正常展开经济工作，可被动的“放任”却成就了共和国历史上相当开放的五年“自由经济时期”。一时间，外资涌入，合资企业四面开花，加之 1927 年政府颁布了《鼓励工业发展法》¹ 为私企发展大开绿灯，整个国民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可这只是借来的繁荣！据奥斯曼帝国 1915 年的统计资料，“当时全国共有 185 家从事‘工业’的工厂，一共有 14 060 名工人。在这些‘工人’中，大约 70% 的人从事毛纺、棉纺、服装和丝织业，另外还有四家面粉厂和一二家烟草厂。就是这些所谓的‘工业’，大部分还属于外国资本所有”^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和国继承的帝国遗产比这还少许多。仅以这点家当实行全面开放的自由经济政策，无异于将国内市场拱手让给西方列强！

因此，土耳其国内市场只能算是西方市场的附庸，西方市场繁荣时，土耳其国内市场随之受益；一旦西方市场发生危机，整个土耳其国民经济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929 年“大危机”爆发后，土耳其很快被卷入危机中，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外贸逆差额高达 1 亿土耳其里拉。恰逢《洛桑条约》适时期，凯末尔政府终于摆脱了经济外压，并能在政治、宗教改革告一段落时，全力应对眼前危机。

当西方经济形势出现一片混乱时，苏联经济却在中央指令性计划控制下高速发展，这使凯末尔政府决定以不触动私有制为前提，最大程度地嫁接苏联模式。1931 年 1 月，“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被正式提出，“政府加强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国家对重要工业部门和对外贸易等经济领域的控制，但又不排斥私人的经营活动。其目的是：‘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把土耳其国家和民族引向繁荣’”^④。很快，土耳其成为除苏联外世界上第一个通过中央指令性计划控制经济，并将发展重心放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的国家。

自 1931 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终止，“国家主义”前后实行了七八年，可就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过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集中资源办大事，土耳其基本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主要外资公司被国家回购，重要工业部门为政府掌握。“国民收入中，工业由 1929 年的 2.41 亿里拉增为 1939 年的 3.14 亿里拉。据统计，在 30 年代，土耳其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 10%，由 1927 年在世界总产值中仅占 0.14% 的比例逐渐升至 1939 年的 0.23%，这使土耳其得以与同时期的苏联、日本和德国相并列，成为当时世界上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④

不过，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对“国家主义”的评价却不高，因为苏联自身就有产业结构畸形、管理过死、计划定立不准等问题，而且土耳其在国内各种旧势力的干扰下，很多措施实施不到位，搞得不像是一种计划经济，而像是一种管理不善的资本主义经济，只是大部分资本系由政府提供而已。^⑤ 时日一长，弊端就显现出来。比如在工业领域，官办企业缺乏有效竞争，官僚主义盛行，决策屡屡失误，浪费严重；政府又垄断着大部分经济资源，致使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受阻；而过度偏重重工业发展，令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很难提高，甚至出现物价不断上涨和工人工资反倒降低的现象。

农业领域的问题更为严重，由于大地主阶层在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内势力庞大，致使农地改革久拖不决，共和国成立十几年后，大多数农户仍然依附于地主过活，封建势力盘踞在农村社会中，不仅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也使农村成为土耳其国内一切旧势力最牢固的堡垒。在实行“国家主义”期间，工业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部门，农业投入被削减得只有工业的 1/3，导致农业发展严重

¹ 这项法案被认为是共和国历史上对私营企业支持力度最大的法案，虽然国家名义上享有对烟、酒、糖、油之类商品的专卖权，以及对铁路、港口、码头的专属使用权，但国家并不直接行使这些权力，而是将其交给本国或外国的公司或工厂，获得生产这些产品和使用这些设施的公司与工厂不但受到国家保护，还能得到很多优惠。由于此法案给私企的条件太优越，1930 年被废除。

^④ 肖宪等著：《沉痾猛药》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42 页。

^④ 同上书，第 99 页。

^④ 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 232 页。

^⑤ 参见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 302 页。

滞后。同时，世俗化改革对保守的农村冲击最大，普通农民的精神损失不但没有从经济建设中得到补偿，日子反而越过越糟，很多人不免对政府失去了信心。

随着经济领域的问题逐渐积聚，城乡民众的不满情绪开始向政治领域传导，并最终引致 20 世纪下半叶土耳其国内经济与政治的持续震荡。

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土耳其共和国在凯末尔时代（1923~1938年）进行的社会改革，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速度之迅急，世人罕见。急风暴雨的变革中，旧偶像被打倒，新观念未完全被人们所接受，社会深层共识难以形成。此时，欲将国民团结起来，就不得不依靠当下、直接的“社会成就”，如：伟人魅力、军事功勋和经济奇迹。可惜凯末尔过早逝世，共和国又奉行和平主义外交原则，这令后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领导者们除了不断推进经济发展，少有其他振奋士气、凝聚人心之策。所以，经济一旦不景气，便直接会影响到社会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实行的战时管制政策使“经济增长率平均为 - 3%。战后初期，土苏关系紧张，居高不下的军费开支阻碍着土耳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加之国家对国营企业的资金、生产、商品流通、价格、公司工作人员的调配实行控制，致使国企生产效率不高，影响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1938~194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 1.9%”¹！对此，逐渐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以及产业工人都颇为不满。农业领域，1945年6月11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让小地主都不安的新土地改革法案，可结果仍是雷声大、雨点小，搞得政府既辜负了农户期望，且失去了地主支持。

而在社会共识根基未深的情况下，土耳其政府又开启了多党制改革，经济问题立刻成为政党斗争的核心。1946年，前总理杰拉尔·拜亚尔和阿德南·曼德列斯等人建立“民主党”，打出“自由经济”的旗帜，主张国民经济从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减小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此论一出，人们狂热支持。在 1950 年的议会大选中，民主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新议会任命拜亚尔为土耳其总统，曼德列斯为总理。民主党上台后，全面否定“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大力推进“自由经济”。

在工业领域，民主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对私企的投资额度很快超过国营企业。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又制定了一些格外优惠的引资政策。^④在农业领域，民主党吸取了“国家主义”重工轻农的教训，将部分国有土地分给农户，对农业投资很快超过对工矿等行业，农业机械化程度得到加深，农业产量倍增。1950~195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40% 以上，成为自由政策的黄金时期。从长远看，走以市场为导向和全面开放的经济发展道路，的确有利于土耳其经济发展，但民主党却走过了头。

在一个商品经济还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家中，把发展经济的重任委之于幼稚的市场，甚至将必要的国家宏观调控都取消掉，任由“看不见的手”去操控。结果，有限私人资本集于轻工业中，纺织、水泥、制糖业产量严重过剩，投资规模巨大、资金周转周期长、收益率低的行业则无人问津。同时，过于宽松的引资政策又导致重要经济部门“过分依赖于外国的投资，使历届政府在制订国内各项方针政策时，不得不听命于提供投资的那些国家，不得不接受那些国家所附带的许多苛刻条件，从而丧失了一定的主权和独立性”，而且“大量的外国投资，使土耳其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包袱”^⑤。至 1960 年，土耳其外债由 1952 年的 7.75 亿里拉跃升到 50 亿里拉，内债达 100 亿里拉，国内通货膨胀严重，

¹ 肖宪等著：前引书，第 180~181 页。

^④ 其中，于 1954 年颁布的第 6224 号法令被称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吸引外资法令”，它允许外国公司把净利润、拍卖收入中外资所拥有的全部或部分股份，清理的全部或部分财产、外国贷款到期后的本利，按当时土耳其官方汇率以外资国家的货币汇往国外。

^⑤ 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前引书，第 263~264 页。

轻工业产品大量积压，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1954年后只有 4.2%，市场机制频频失灵，经济领域一片混乱。面对置疑与抗议，民主党竟用专制手段维持统治，导致国内矛盾激化。1960年 5月 27日拂晓，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成立“团结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议会和政党活动一律暂停，民主党人受到严厉清算，总理曼德列斯被处以绞刑，总统拜亚尔被判终身监禁。当年 10月，团结委员会制定出此后 20年国民经济发展的 3个五年计划，土耳其似乎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轨道上。

所幸历史没有重复，经此动荡，人们开始意识到：落后的土耳其若要平稳地发展经济，既不能靠管得过死的国家指令性计划，也不能任由不完善的市场左右，而应在计划与市场、私有与国有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走一条混合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因而，1961年军方还政于民后，新政府选择了中间偏左的经济发展路线，政府计划趋向宏观层面，对国营企业的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和重工业部门，日常消费品领域则大力扶植私企发展，同时努力将竞争、风险机制引入国营企业中，以激活其生产、经营积极性。3个五年计划原定年增长率为：7%、7%和 7.4%，实际完成情况为 6.7%、7.1%和 6.9%，总体情况尚好。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改革却未能及时跟进。由于沿袭 20世纪 30年代就开始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¹，加之政府对国营企业放权不到位，在高关税与权力保护伞下，国企运营涣散，50%以上严重亏损，全靠政府补贴才得以生存。政府在社会资源分配上握有的大权也诱使私企的经营重心偏离市场，转向官场，千丝万缕的官商利益网严重地干扰市场机制的作用。^④在农业领域，农地改革一拖再拖，落后农业生产结构逐渐与现代工业脱节，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多半来自政府对地主的巨额补贴，普通农户从中得不到好处，反而在地主推进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大批破产。

就在土耳其面临人口膨胀与高失业率困扰时，联邦德国经济开始腾飞，1973年该国人均月收入 739美元，土耳其仅为 63美元，土耳其劳工开始向联邦德国涌去。^⑤输出劳务虽能部分缓解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但非长久之计，还衍生出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进口替代战略造成国际收支长期逆差，1971年国内爆发严重通货膨胀，社会混乱，军队二次干政才保全了第三个新五年计划。为平衡收支，“举借国外短期贷款逐年增加，已经严重超过了一个国家正常的偿还能力。如 1973年土耳其的外债已经达到了 135亿美元，光每年偿还的利息就达 6.6亿美元，大约占土耳其每年创汇的 32%”^⑥。

20世纪 70年代中期，能源问题成为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瓶颈，并影响到政治领域。土耳其政府在外交上一直小心维持着东西方之间的平衡，“但是持续高涨的油价超过政府的支持限度，使土耳其政府不得不屈从于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后来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一系列苛刻要求。最初这些要求还主要是经济上的，但后来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要求也被提了出来”^⑦。平衡外交受到冲击，国内政治均势难免受到影响，各方矛盾每每激化，恐怖事件明显增多。1980年，严重的经济衰退最终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军队只得发动第三次政变，才使全国局势得以稳定。

1983年，军方还政于民，被称为土耳其“经济设计师”的厄扎尔出任总理，经济发展方针从中左调向中右。土耳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被进一步缩小，私有经济受到更大力度的支持，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开始多样化调整……这些措施使经济恢复平稳发展态势。两伊

¹ 即：为了推进经济体系现代化，采用高关税政策来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并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和政府举债的方式筹措资金，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

^④ See Ziya Onis *State and Market*, Istanbul Bogazici Vniversite Press 1998, p 244.

^⑤ See Leslie Page Moch *Moving Europeans Mi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65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86.

^⑥ 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前引书，第 272~273页。

^⑦ Sabn Liel *Turkey in the Middle East Oil, Islam, and Politics*, translated by Emanuel Lottm,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1. p. 5.

战争爆发后,伊朗和伊拉克变成土耳其出口商品的巨大进口国,扭转了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在外贸上的被动局面。1990年,阿塔土尔克水库在幼发拉底河上建成蓄水,这使土耳其能利用其丰富水资源来对抗他国的石油胁迫。¹土耳其经济因此得到加速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由1981年的1540美元上升为1995年的2713美元,2000年突破3500美元”^④。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尽管土耳其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启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但在国内政治反对派的严重阻挠下,进展速度有如冰川移动。”^⑤85%的国企在亏损,年亏损额高达30亿美元左右,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高通货膨胀、高利率的情况下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的‘土耳其奇迹’也无以为继。政府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偿还政府债务的费用高得失控,能提供给私营企业的政府借款微乎其微”^⑥。截至1999年,土耳其外债总额达970亿美元,外债率高达31.9%,而国际货币储备仅有200亿美元,国家金融信誉等级很低。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2000年时,东部农业省区人均收入仅1000美元,西部沿海发达省份则有5000美元!这些问题都使倚重市场的中右政策受到挑战,进入新世纪后,土耳其富国之路依然崎岖。

结 语

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现代资本运营体系很早就已存在,但作为一种长时段的结构,“不等于说是一种绝对静止不动的实在。所谓长时段,就是一系列的反复运动,其中包括变异、回归、衰变、整治和停滞,或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构成、解构、重构……有时也会出现重大的断裂,虽然这种机会很少”^⑦。资本运营体系的成长尚且如此复杂,整个西方社会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经历三五百年便不足为奇了。然而,非西方国家被卷入现代社会前,内部并未经历或完成这种演进,只是为了救亡图存,后进国家才不得不在短短几十年内去完成西方国家三五百年才完成的转型,这不可避免地会在国内社会中产生剧烈震荡。

回首土耳其共和国20世纪经济建设所走过的道路,这种震荡主要体现在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现代化与市场化的矛盾上。为迅速实现经济现代化,在国内市场体系残缺不全、民族资产阶级幼稚落后、封建保守势力顽固庞大的情况下,走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的道路似乎是一条捷径,但它又会抑制国内市场体系的发展。相反,若脱离国家计划控制,搞完全自由经济,在强大的世界竞争者面前,很难保住国民经济的自主性,况且市场经济自我完善的过程缓慢,令后进国家等待不起。因此,既实现经济现代化又促使市场体系成熟,就成为土耳其经济建设的重要课题。为完成此课题,从1931年的“国家主义”到1950年的“自由经济”,再从1960年的中左路线到1983年后的中右路线,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计划与市场间来回摇摆。不过,其幅度呈现出逐渐减小的趋势,对整个社会的震荡程度也不断减弱,国民经济体系在连续调整中,逐步接近市场与计划的良性平衡。目前,土耳其经济虽有许多棘手问题,但发展模式已不像当年那样极左或极右地剧烈变动,而是在一套符合国情的方略下较为稳健前行。这种通过经济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活动,以达到较高平衡状态的经验,值得相关国家参考或借鉴。

再者,从经济建设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来看,由于土耳其的改革目标与其历史文化传统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导致思想、政治领域内矛盾丛生,社会深层共识一直难以形成。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经济状况好坏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凸显,通货膨胀、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经济问题往往

¹ See SAcon lie] op cit., pp. 121- 122.

^④ 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前引书,第327页。

^⑤ Charles W. I Hill *Global Business Today*, New York: The McGraw - Hill Companies, Inc., 2006 p. 367.

^⑥ Ibid., p. 368.

^⑦ [法国]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22页。

可以打破政治领域中脆弱的平衡，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土耳其 1960年、1971年和 1980年军事政变莫不如此。而每到改革派在经济陷入困境时，一些人就会将政治改革视为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将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繁荣简单地联系起来。这种思路在西方学界也十分流行，以至于晚年的罗尔斯也觉得政治正义与经济好坏之间有密切联系，国家间经济差异的关键性因素在政治文化方面。¹

毋庸置疑，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可经济体系却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历史惯性，一场选举、一次政变不可能彻底改变经济世界，即使是全面的政治变革，对经济世界的实质性影响也要在相对长时段中才能显现出来。同时，作为两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很难断定这影响就一定为好，弗里德曼曾冷静地指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决不是一个方面导致另一个方面”^④，更不必说政治自由一定导致经济繁荣了。发展经济固然要靠政治大力配合，但不能奢望所有经济问题会因此迎刃而解。况且，在一个还未形成稳定深层共识的社会中，政治多元化带来的并不一定是正面影响，政治改革若不慎重，经济发展便欲速而不达。

最后，土耳其农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值得人们深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指出：“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正在进行工业化。其中大部分国家在实现工业化时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增加农业生产。某些国家以损害农业来实现工业化。只有少数国家从工业和农业中都得到了大幅度的经济增长。成功地发展自己的农业部门，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真正源泉的只是个别例外的国家。”^⑤在他看来，美国就是个别例外的国家，而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则陷入“工业原教旨主义”的误区中，为了追赶西方，迅速实现工业化，大量资金投入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中，甚至有时不惜以损害本国农业经济为代价。土耳其多少也陷入到这种误区中难以自拔，多年来，经济建设的重心都在城市工业方面，对农业重视不足！更严重的是，农村中落后的生产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这使广大农村不但经济落后，而且政治保守，成为土耳其诸多政治不稳定因素滋生的温床。与之相比，1946年日本在盟军总部重压下出台的土改方案就很到位，其中规定：“政府在两年之内，强制收买在外地主的全部自耕地，和农村地主平均一公顷（北海道为三公顷）之外的自耕地，并在原则上将这些土地再度卖给佃户。”而“农地改革的结果，最突出地表现在地主阶级的没落”^⑥。这使日本的整个经济发展摆脱封建性干扰，而政府对农业投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小农户，农民大大富裕起来，投资能力也相应增加了。

农业与工业能否共同发展，以及广大农民能否在农业现代化中富裕起来，对于农业人口居多的后进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只有飞速发展的农业才能养活城市中不断膨胀的人口，为大部分轻工业部门提供重要的原材料，而且倘若有一个富裕的农村存在，“那么工业在城市对其产品的需求饱和以后，就能够继续增长，而不必在没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之前便要转向国外市场”^⑦。然而，由于土耳其未能摆脱封建性农地关系的束缚，在落后的生产关系作用下，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只能使地主得利，而由地主推动的农业现代化，不仅不会富农，反而使大批普通农户破产，这对城市中脆弱的工业体系非但没有促进，反而造成极大的压迫！这些教训使我们看到，推进农地改革，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广大农户共同富裕对广大后进发展中国家的重大意义，只有这些工作做好了，才会有一个摆脱封建性影响的现代社会存在，才会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良好基础，才能使市场经济在各种危机面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邢永平）

¹ See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08-110.

^④ [美国]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张瑞玉译：《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页。

^⑤ [美国] 西奥多·W·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页。

^⑥ [日本] 有泽广巳主编；鲍显铭等译：《日本的崛起——昭和和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477页。

^⑦ [美国] 德怀特·H·波金斯等著；黄卫平等译：《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

The Heteronomy of Islamic Law and Self-regulation of Ethics

Liu Yueqin

pp. 5– 10

There existed interdependent and indivisible relations between Islamic law and moral and they originated from the same source and different branches had the function to norm and constraint social action for Muslim. The social meaning of Islam ethics was its sociality and its internal tension had the same effect with the legal despite of its mandatory under the law of society. The law had the feature of strong mandatory and the moral had the

weak one. Islam Law tried to regulate and restrain people's action from deviating the way advocating by Allah and the moral tried to constraint motivation of people's action by means of education. Moral had sacred mission of social education which people would follow basic value with popular meaning. The self-regulation of ethics was far prior to the heteronomy of Islamic law.

The Results of the Modernization and Works of Codification

—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Ma Mingxian

pp. 17– 23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produced in the end of 1970s and early of 1980s, was an Islamic law, it was a classical works of constitutional codifi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Islamic legitimacy and now it wa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law to understand Iran's current political system, national organizations, Iran's current constitution, established modern Iran's constitutional

system based on Islamic politics and law with new characters and contents of traditional Islamic political and legal theory, has focus on following issues such as national beliefs, governmental building, social reality and growth target after Iran's revolution. This constitution has made positive and decisive influence on Iran's nation and social and that will ensure Iran to follow the way of Islam in the future.

Swinging from the Planned and Market Economy of the National Rich Strategy

— Commentary on Turkey's Economic Reform in the 20th Century

Cao Ruitao

pp. 24– 29

The Republic of Turkey conducted a series of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20th century, those demonstrated that both the central planned and the market economic are not suitable for Turkey's national conditions. It is a significant task for Turkey, a less advanced developing country, to reach the growth target in decades which fulfilled by west countries in hundreds years. Turkey tries to explore a suitable growth way which can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to cultivate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oth of them has complicated relations with politics, culture and ev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urkey society. It is useful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exploring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experienced in Turkey.